

CSSCI 来源集刊

语言研究集刊

第十七辑

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
《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



上海辞书出版社

CSSCI 来源集刊

语言研究集刊

Bulletin of Linguistic Studies

第十七辑

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

《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



上海辞书出版社

《语言研究集刊》网址：<http://yjjk.chinajournal.net.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研究集刊·第十七辑/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编.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 - 7 - 5326 - 4159 - 8

I. ①语… II. ①复… III. ①语言学—丛刊 IV. ①H0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17893 号

责任编辑 李潇潇 马 沙
装帧设计 杨钟玮

语言研究集刊

第十七辑

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o www.cishu.com.cn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8⁶₁₈ 字数 329 000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6 - 4159 - 8/H · 654

定价: 6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512—52219025

《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

主 编 陈忠敏
编 委 (按姓氏拼音排列)
陈忠敏 傅 杰 龚群虎
刘 刖 杨剑桥 游汝杰
编 辑 部 陈振宇 霍四通 刘 娇
陶 寰 张新华
本辑执行编辑 陈振宇 霍四通
本辑英文审订 冯予力
责任编辑 李潇潇 马 沙
封面设计 杨钟玮

目 录

汉语史观和汉语史研究方法论	陈忠敏(1)	
高本汉论汉语汉字特征的启发	李如龙(21)	
高本汉对汉语方言学的贡献及相关问题探讨	游汝杰(33)	
汉语唐代四声的声调特征与全浊上归去的产生	郑张尚芳(47)	
《切韵》音系元音音位构拟研究述评	董建交(52)	
东南方言几个古知组二等字特殊今读的性质	庄初升 万 波(71)	
晋语蟹效摄一等开口字锐钝分韵现象及其意义	王为民(85)	
中古鼻音与擦音声母字在早期汉语中的语音交替	郑 伟(100)	
编纂汉语方言比较词典的设想	秋谷裕幸(115)	
危险的跳跃：语码转化和语素透明度	陶 襄 史濛辉(135)	
一代移民习得上海城市方言 E 韵字初探	平悦铃 马 良(151)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的重要性与《助读》《读解》	朱庆祥 方 梅(162)	
轻动词理论下的论元结构研究综述	朱佳蕾(174)	
从“有时”“偶尔”看量化副词中的主客观对立	孙嘉铭(198)	
基于事件的“个个”及“一个一个”形式语义分析	冯予力(216)	
论上古汉语确有“为”字句被动式	杨剑桥(232)	
成都话“哇字句”语用功能的形成	杜克华 陈振宇 陈振宁(252)	
福建莆仙方言的框式结构“罔 A 罔 B”和“来 A 来 B”	蔡国妹(266)	
江苏盐城话的持续体标记	蔡华祥(278)	
元语否定的两个层次	钱 鹏(292)	
CONTENTS	(315)	
稿约	(325)	

汉语史观和汉语史研究方法论

——纪念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出版 100 周年^{*}

陈忠敏

提要 文章通过比较马伯乐与高本汉研究的异同,来全面、系统总结高本汉的汉语史观与研究方法。然后深入剖析高氏的史观和研究方法,指出他的缺陷,并提出相应的修改方案。

关键词 高本汉;《切韵》;《中国音韵学研究》;中古音;原始汉语

瑞典学者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是世界著名的汉学家,也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他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原书于 1915 年至 1926 年分四次出版,中译本由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翻译,1940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以下简称中译本)全面、系统阐述他的汉语史观和汉语史研究的方法,其思想和研究方法对后世的汉语史研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高本汉所著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开始出版已经有 100 年了,我们需要总结高氏的思想、研究方法,回顾从《中国音韵学研究》以来一个世纪汉语史研究所走的路,在思想上和方法论上更上一层楼,提出适合研究汉语史的新路子,把汉语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二

与高本汉同时期或略早于高氏的汉学家有法国的沙畹(Emmanuel

* 本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上海市方言地图集”(批准号 15AYY005)、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方言自然口语变异有声数据库建设”(批准号 12&ZD177)支课题“上海方言自然口语变异有声数据库建设”资助,特此鸣谢。

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马伯乐(Henri Maspéro, 1883—1945)等,其中马伯乐是高本汉较为敬重的,也是高氏一生的诤友。高本汉认为中国的语言“只有一个有效的起点,就是古音”,以往的研究“除去上面所讲的马伯乐的工作外,没有能够给多少有意义的结果”,只有“马伯乐曾用古音做起点,又用一个谨严的方法,作了一部很有趣的第一流的单刊来研究中国境外一种方言,就是安南译音”(中译本:7)。虽然他对马伯乐的一些观点并不认同,并加以辩驳,“但是在马伯乐其他的说法当中有几件是绝对可信的,我对于那些就放弃我自己的旧说改从他的说法”(中译本:537)。跟沙畹、伯希和相比,确实马伯乐的汉语语音研究更为全面和系统。不过,在汉语史观和研究方法论方面,高本汉跟马伯乐具有质的差异,我们比较两者的不同,可以看出高氏的高明之处。

高本汉最早对汉语史做了系统而完整的分期,在中译本第一卷“古代汉语”第20—21页里他把汉语发展史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上古汉语”跟“太古汉语”

第二阶段:“中古汉语”——“纪元500年到600年之间以《切韵》为代表的音”

第三阶段:“近古汉语”——“就是韵表的音”(宋元时期的韵图)

第四阶段:“老官话”——“就是《洪武正韵》的音”

同时期的汉学家马伯乐(1920/2005:3)在他的《唐代长安方言考》中则把汉语史分成三个阶段:

上古汉语 早期:先秦

 晚期:汉和三国

中古汉语 早期:六朝和初唐

 晚期:晚唐和宋

官话 早期:金、元和明初

 晚期:明末、清

马伯乐的分期晚于高本汉,显然也受高氏分期的影响。因为马氏在自己的书里比较了高本汉的分期与他的分期的异同,认为他的分期与高本汉的分期并没有多少区别,只是名称有点不同,且每个阶段再分出早晚两期(马伯乐1920/2005:3)。

《切韵》的性质一直是音韵学家争议的焦点,直至今日还是音韵学的一

个热门话题。高本汉和马伯乐都认为《切韵》代表唐长安音系。马伯乐的书名就是《唐代长安方言考》,《切韵》音系等于唐长安音不言自明,他在书里也阐明了这一观点(马伯乐 1920/2005: 3):

这部字典通常被看作南京地区长江下游方言的佐证,但是这种看法却并不正确:所有的证据都倾向于说这部字典是依据北方方言编成的,最有可能是依照长安话编成。

高本汉也认为《切韵》是一时一地的音系,他说(高本汉 1954/1987: 2):

我们用“中古汉语”(Ancient Chinese)指代《切韵》纂集的公元 600 年左右的语言,这实质上就是陕西长安方言,这一方言在唐朝成为一种共同语(Koine),除沿海的福建省以外,全国各州县的知识界人士都说这种语言。

他在这一段的注文里更为详尽地解释了这个“共同语”的性质:

有理由说,各地的底层民众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本地区的方言俗语,许多地方土话里仍可以分辨出中古方言的痕迹。但共同语却极为广泛地传播开来,并且被从最高级官吏到中下阶层的绝大多数人所接受了,从而成为几乎是全部方言的母语(福建与毗邻地区的闽方言除外)。《切韵》韵类和各个现代方言韵类之间的严整对应关系确凿地表明,《切韵》描写了一种实际存在过的、单一的语言,而不是像许多近来的学者所论述的那样,《切韵》是一种人造的、由各方言中的参差成分所构成的折中混合的语言。

如果说对汉语史的分期、《切韵》的性质这两点高氏和马氏还有相同点的话,那么他们的汉语史观和研究方法就显示出较大的不同。高氏的汉语史研究有他的终极目标,这一点在马伯乐的研究里是缺乏的。高氏在他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绪论”第 3 页十分明确地阐述了汉语史要研究的三个问题:

1. 考证中国语言学的祖先跟来源
2. 考清楚这个语言的历史
3. 考明白现代中国语言的各方面

“绪论”的第 4 页他又说:

要想一个古音的拟测能够成立,当然先得费好多功夫使它跟这个语言的历史上的旧材料相合;其次,还要能够把中国全部方言(不只一两处方言),解释到一种可信的程度,就是在每个方言必得能找出一套声音演变的历程,从语音学的观点看都得成可能的变化。

“绪论”第 13 页再一次强调了这个工作程序:

中国语言学现在还不过刚在起头的时候,这是得要承认的。在我一方面,我愿意对于这个新科学的建树有所贡献,我就想开始:

1. 把中国古音拟测出来,要想做系统的现代方言研究的起点,这一层是很必要的;
2. 把中国方言的语音作一个完全描写的说明,作过这层之后然后可以;
3. 用音韵学的研究指明现代方言是怎样从古音演变出来的。

构拟原始母语,解释从原始母语到各子语言(方言)的演变,这显然是西方历史比较法的程序。高本汉熟悉历史比较法,是第一个系统地用比较法来研究汉语史的人。按比较法的程序,构拟原始母语后必须得解释从原始母语到各子语言(方言)的音变途径,而原始语的构拟必须比较子语言(方言)的同源词语音形式,找出合理的音变步骤。所以高氏在“绪论”第4页中说:

要想一个古音的拟测能够成立,当然先得费好多功夫使它跟这个语言的历史上的旧材料相合;其次,还要能够把中国全部方言(不只一两处方言),解释到一种可信的程度,就是在每个方言必得能找出一套声音演变的历程,从语音学的观点看都得成可能的变化。

在“绪论”第13页又说:

要得到可靠的结果,我以为要把我的研究放在一个很宽广的基础上。每一条语音定律只有少数的几个例是不行的,因为少数的例不能作充分的保障。所以我拿来作基础材料的就有三千一百上下语言中常用的字(不过有些很常用的字倒是没有收,因为未能确定考出它们在古音中的地位)。这么多的材料我觉得已经够把我要找的结论确定到相当的重要地位了。

由于高本汉熟谙历史比较法的真谛,他的研究的起点一开始就比同时期的其他人高。比如他和马伯乐都是以《切韵》为研究汉语史的切入点,但高氏构拟《切韵》音类的音值是比较了汉语33个方言点(其中4种为域外译音)的3000多汉字的读音,而马伯乐用的主要是藏文对音、域外对音、译音材料,如日译汉音、越南译音等。与汉语方言材料相比,对音、译音材料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1. 对音、译音的种类、材料远没有汉语方言多和整齐。2. 域外对音、译音都会受到本语言语音格局的制约,做出调整,如果不经过一番梳理是无法直接用来比较的。3. 更为重要的是构拟出来的音值首先必须满足能解释子语言(方言)的各种演变而不是去解释域外对音、译音。所以

从方法论上说,用汉语方言的材料应该优于用译音和对音材料。正因为高氏比较了33个方言点的语音材料,他的中古音构拟比马伯乐更合理。

我们可以举出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高氏与马氏在上述三点上的不同。高氏的中古音韵母的韵腹构拟方法是找一个具有代表的韵摄,分析它的元音,然后用这个模式来类推其他韵摄。高氏分析的代表韵摄就是山摄,因为山摄开合及四等都齐全。他说(中译本:455):

这一摄从许多方面看都是很可以作代表的。如果弄清楚了山摄的古代的元音,我们同时就得到可以共同应用的结果来帮助我们解释别的摄了。

马伯乐等人根据对音和译音把山摄的一、二等的主元音构拟为相同的a,高氏则发现山摄一、二等字的韵腹在汉语某些方言里存在着区别,一般的情形是一等元音较高较后,二等的较低较前。于是高氏得出结论(中译本:461):

在现代方言里,一等字最为常读的是o,二等字最常读的是a。别的语言的经验告诉我们,深a最容易变为o。这两等在古代汉语既然严格地分成不同的韵,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定一等为深a,二等为浅a。

现在,同韵有一、二等不同的分设两个韵腹元音已为共识。表1是各家中古山摄一、二等拟音(仅列韵腹和韵尾):

表1

韵摄	等别	韵	高本汉	董同龢	李荣	王力	邵荣芬	郑张尚芳
山摄	一等	寒	aŋ	aŋ	âŋ	æŋ	aŋ	aŋ
	二等	删	aŋ	aŋ	aŋ	aŋ	æŋ	aŋ
		山	ãŋ	æŋ	äŋ	æŋ	æŋ	ɛŋ

用前a后a来区别二等与一等的元音,奠定了中古音韵母系统的基础,而且也能很好地解释现代各方言的对应。高氏的这一研究结果从方法论上告诉我们,汉语方言材料远比译音、对音材料丰富、整齐和重要;更为重要的是,中古音的构拟必须首先要满足能合理解释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化和不同,因为现代汉语方言是中古音的“子语言”,而不是对音和译音。高本汉自己也说:“对音的材料固然很重要,不过最好是先从本国的材料得了结果,然后再拿对音当一种试金石来对一对”(中译本:15)。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高本汉得出了他自己的汉语演变史观。他(1954/1987:2,8—9)在《中上古汉

语音韵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说:

现代汉语方言的声韵分类都是显示出他们全是(闽方言除外)从《切韵》语言派生出来,而《切韵》语言在唐朝曾作为一种共通语传遍了中国国土上的所有重要的城镇。

其实这一史观的形成在《中国音韵学研究》已经具有雏形。《中国音韵学研究》第三卷“历史上的研究”中讨论“声母9—16：知彻澄照穿床审禅”时(第324页)说：

在中国境内的方言里,福州话跟厦门话是把古代汉语爆发音和塞擦音的分别保存的最好。关于古塞擦音,它们只有塞擦音。古代爆发音知澄两母总是读成爆发音,彻母中有些字读成爆发音。所以在这方面上头,这两种方言是很古的。

高本汉认为《切韵》代表唐长安标准读音,也是现代各方言的原始母语,因为现代各方言读音都可以从《切韵》语音系统得到解释,运用《切韵》“可以把中国全部方言(不只一两处方言)解释到一种可信的程度”(中译本:4)。至于《切韵》以前的汉语,现代的方言就记不到了,只能通过《切韵》联系上古文献往上推。所以高本汉汉语史观是一种直线条的演变模式,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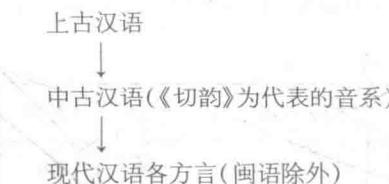


图1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高本汉的汉语史研究成果。高本汉把当时业已成熟的历史语言学研究方法,如历史比较法、内部拟测法引进到汉语语音研究中来,为汉语史研究,特别是中古音的构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引领后人往这条科学的路子上走下去,这是他最为重要的成就。他的具体研究方法是以《切韵》为汉语史研究的切入点,认为《切韵》是一时一地的音系,代表公元600年左右唐长安音系,然后通过比较现代方言语音和域外译音来全面、系统地构拟《切韵》音类,并以此为起点,上推上古汉语,下联现代汉语方言,提出他的汉语史观。高氏的研究方法和他的汉语史观深深地影响以后的学者,他的这些观点也为后世的主流汉语史学者所遵行。

三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出版至今正好是一个世纪，随着汉语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可以用新材料、新认识来全面审视高氏汉语史研究的方法和汉语史观。下面我们分三点来全面检讨高氏的上述观点：第一，《切韵》性质的再认识；第二，高氏的研究方法再探讨；第三，高氏的汉语史观再认识。

（一）《切韵》性质再认识

《切韵》的性质一直是汉语音韵学界的讨论话题。因为中古音的依据是《切韵》，它的性质的不同直接关系到是否可以把它作为坐标上推上古音，下联现代方言。高本汉认为它代表唐长安音系，不过他的这一观点曾遭别人的质疑，质疑的理由是：1. 《切韵》一书收有方言和古音成分，作者在切韵序里也有明确的交待；2. 《切韵》的写作目的是制定读书人作诗押韵的标准，并不是也不可能像后世那种语言（方言）的音系描写；3. 根据研究，《切韵》音系的声母有 37 个，韵母有 160 个（林焘、耿振生 2004），声母韵母总数接近 200 个，这么庞大的数量，特别是韵母的数量，在它的子语言——现代方言中是找不到的。所以，持综合说的学者根据上述三点理由认为《切韵》是一部兼顾古今南北的语音特点而写成的韵书，不是代表一时一地的音系。持单一音系的学者则认为《切韵》体系严密而完整，很难想象这样严密、完整的体系是由古今南北之音凑合而成的，更为重要的是，《切韵》是上推上古音，下联现代方言的枢纽，上古音的构拟成功与否跟是否能解释以《切韵》为代表的中古音的分类有直接的关系，一旦承认《切韵》是综合音系，就会严重动摇上古音构拟的根基。周祖谋《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对此作了新的解释。他认为《切韵》是代表六世纪前后金陵、洛阳一带的读书音（周祖谋 1966）。此观点被后世多数学者所接受。不过周的观点仍有不完备之处。如果是单一的读书音，也无法解释上述 2、3 两个疑点。丁邦新先生（1995）提出一个新设想，他根据颜之推《颜氏家训》及《切韵》序里记载的南北方言差异，认为《切韵》蕴含着邺下（洛阳）、金陵为代表的南北两个语音系统，所以可以为《切韵》构拟一南（金陵）一北（邺下）两个音系统。丁先生（1995）根据他的设想作了一个练习（见表 2），以此来说明两个韵类叠加而成的《切韵》系统。《切韵》（王三）韵目下有小注：“愿，夏侯与恩别，与恨同，今并别。……恩，吕、李与恨同，今并别。”

表 2

夏侯该	愿		恩
吕静、李季节	(愿)		恩
《切韵》	愿	恨	恩

结果是《切韵》的分类都比夏侯该和吕静、李季节的多。丁邦新先生(2015: 57)根据颜之推(讨论《切韵》语音九人之一)《颜氏家训·音辞篇》里所说的“南人以钱(从母)为诞(邪母)”,“以溅(从母)为羨(邪母)”的记录,为《切韵》的邺下和金陵拟测了两套相关语音(见表 3),其中邺下音系设立从母,金陵则从邪合流,只拟测邪母。

表 3

邺下音系						金陵音系					
精	清	从		心	邪	精	清			心	邪
ts	ts ^h	dz/dz ^h		s	z	ts	ts ^h			s	z

笔者曾撰文证明北部吴语白话层只有读浊擦音 z 的邪母,没有读浊塞擦音 dz 的从母,可见北部吴语是金陵音系的直接继承者。今从母字读浊擦音 dz 是文读层,这种文读的来源是早期的杭州话(邺下音系的继承者)。随着杭州话的影响力在整个江南地区式微,文读层 dz 在各地吴语里保留的程度不一,呈现“一处一个样”的局面(陈忠敏 2015)。用金陵音系的直接继承和以后邺下音系的渗透可以很好说明北部吴语 dz/z 混用的情形。“邺下-金陵说”也可以完美解释上述 2、3 两个疑点。把表 3“邺下音系”与“金陵音系”两个音系叠架套合也不违背《切韵》“精清从心邪”的声母分类。从高氏的唐长安音系,到周祖谟的金陵、洛阳一带的读书音,再到丁邦新先生的“邺下-金陵说”可以看出高本汉以后学术的进步。

(二) 对高本汉研究方法的再探讨

毋庸讳言,高氏比较方言语音的方法,也即历史比较,是移植历史比较法的。第一个缺陷早有人指出,高氏的汉语方言材料偏重于北方官话,缺乏南方方言。《中国音韵学研究》书中提及的汉语方言达 33 种,不过第四卷“方言字汇”只罗列 26 个方言点 3 125 个汉字的读音,其中 4 个是域外汉字读音(高丽、汉音、吴音、安南),除去域外汉字读音,汉语方言有 22 个点,但

是只有 6 个点是属于南方方言的。这种材料的欠缺直接影响高氏的中古音构拟,因为一般来说中古音的痕迹在南方方言里保留得更为齐全。比如,《切韵》的反切系统里四等韵的反切上字与一、二等属同一类,而与三等不同,所以高氏认为四等韵的声母属于非 j 化类。但是在高氏所列的 20 多个方言里四等字往往带 i 介音,这又与三等韵的情况相同,于是他认为四等韵在中古是带有介音的,三等是 j 化的介音,那么四等就是元音性的 i。其实在高氏没有看到的南方方言里四等韵不带介音的还真不少,现代方言中的介音 i 是后起的,是前高元音前的增生。笔者曾研究过闽语齐韵的读音层次,四等齐的白读在很多闽语里都没有 i 介音,有 i 介音的倒是晚起的(陈忠敏 2006)。如果把四等拟测为不带介音的韵母就能很好解释《切韵》系统里的声母韵母的搭配关系,如一等、四等声韵配合同,都有端组没有知组,而二等、三等正好相反,有知组没有端组。再比如高本汉认为汉语方言里不存在脂之两韵的分别(高本汉 1948: 492),后来罗杰瑞发现在福建有些地方的闽语里其实存在着两类韵读音不同的现象(罗杰瑞 1988)。这些都是因为高氏所收集的材料有限,才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历史比较法发轫于对印欧语的历史研究,中西方语言演变的背景不同,直接移植历史比较法来研究东方语言也有可能会水土不服。历史比较法最为重要的步骤是确定各亲属语言里的同源词,然后排比同源词的语音形式,按照自然音变来构拟原始读音,并解释各子语言的各种演变。汉语方言相互间的亲属关系毋庸置疑,而相同的汉字可以认为是同源语素,所以在汉语方言里确定同源语素从来都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高本汉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第 547 页到 731 页排列了 26 个方言点 3 125 个汉字的读音,这些字当然是同源语素。但是天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买卖,汉字不是表音文字,某些字可能有几种读音,到底拿哪个音作为比较对象来建立语音对应关系并不是一件很容易解决的事。只有建立方言间的语音对应关系,才能正确推导出音变的途径和方向。语音对应关系的建立看似简单,其实并非易事。Fox (1995: 61) 曾指出语音比较中所比较的项目必须是来自原始母语的(排除语言接触因素),而且还必须是对等形式:

We have noted, however, that in order to be eligible for use in correspondence sets, languages or their forms must be not merely genetically related, but genetically equivalent.

Fox 在这里所说的发生学上的对等是指参与比较的语音项目必须是在同一层次上的,换句话说,比较的项目是同一层次上的同源词。如果语音比较不是建立在对等形式基础上,语音比较和语音构拟就会步入歧途,从而也无法正确阐明语言演变的历史。历史比较法没有一套现成的方法来告诉研究者如何做。由于汉字不是表音文字,某些字可能有一字多音现象。对于这些一字多音,高本汉有他自己的处理方式。原书第 547 到 731 页每页字都有正表,正表下都有附注,高氏就用正表和附注把一字多音分列开来,只有正表里的字才用于方言语音比较。哪些字放入正表,哪些字列入附注,高氏在表前有文字说明(中译本: 540):

常常有一个方言对于古某字音有两种或几种读音: 有时候古同音字中这几个字读甲那几个字读乙,有时候在同字上有甲乙两种读法。这种不同的读法最多的是文言白话的不同,但也常有在同一体当中有两种读法的,那就只好拿方言的混合(因迁移等等原因)来解释了。为印刷上的方便,我只能把几种中的一读排入正表,其余的就放在注里(有时候把文言音有时候把白话音放在注里——看把哪一方面提出来说是最省篇幅)。

可见正表里的字音有文读音也有白读音。那么,为什么文读音和白读音可以放在一起比较呢? 换句话说决定放在正表和注里的原则是什么? 高氏书中有解释(中译本: 539):

现在这个字汇既然同时也当作各韵母的一个系统表用,那么在表的正文里头所记下的音就非得限于照规则变化的字不可。要知道怎么样读法才算照规则的读法是这样求的: 在某方言读音中,把古音的某韵母在某系的声母的字全部查一道,如果多数是一种读法,这就是这个方言对于这韵在这系的规则的读法(例如见系后的古 [a] 音为一类,看方言中所有的古 $k\alpha$, $k^h\alpha$, $\gamma\alpha$, $\eta\alpha$ 等的 a 是怎样读法)。所以在字汇正文表里头每竖行当头第一个代表字总是想法子选一个能在处处方言都是照规则读的字,例如古音 $k\alpha$ 有歌,哥,个三字,其中歌字在处处方言都是规则的,所以把歌字放在竖行当头第一字。次之若有“不规则”的读音,就是说古音虽同而某处今音不跟被选的代表字(如这个例中的歌字)同音者,就在注里标出(如哥字大同 $k\omega$)。

通过上述的引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高本汉方言语音比较的特点:

第一,方言语音比较是以中古音(即《切韵》的音类)为纲的。历时的语音比较就是以《切韵》的音类为出发点看方言语音的音类分合,共时的语音

比较也是以《切韵》为中介来看不同方言语音音类的对应。

第二,3 125 个是字音(汉字读音),而不是词音。换句话说高氏选字音注重是否能覆盖中古音类的分别,而不管是否在口语里常用和是否成词。

第三,把《切韵》每个韵中的多数读音作为“规则读音”看待,附注的读音则为例外读音。所以方言间或方言与中古音比较其实就是“规则读音”的比较。

高本汉这种语音比较的方法显然跟 19 世纪历史语言学家的做法是一致的——排列规则的音变,同时把认为不合规则的例子作为注解罗列出来。格里姆(Jacob Grimm)在他的《日耳曼语法》一文里就是首先排列规则音变的例子,然后在附注里罗列不合规则的例子。在解释这些不合规则的例外时,他也说是借词或者是纯偶然的巧合:“有些字停留在古老阶段,而音变的洪流越过它们,滚滚向前。”(Grimm 1822,据 Lehmann 1967: 57 英译本翻译)

那么用高氏的方法是否可以建立正确的语音对应关系呢?我们来检查一下他的具体做法。我们发现高氏书中的“方言字音”正表里的字音取舍是有倾向性的,即所比较的现代汉语方言字音只是为既定的《切韵》音类做拟音参考。如果方言字音与《切韵》音类的格局发生矛盾,前者要服从后者。换句话说《切韵》的分类是第一位的,现代方言的读音是第二位的。比如高本汉已经注意到当时上海话里从母邪母很多字都有 dz/z 两读,有的字只有 z 一读(中译本: 376):

在上海有些人老读 z。可是另外些个人能分 dz 和 z。能分 dz 和 z 的人在“蚕槽曹造皂贼凿座坐族前墙净字自匠嚼”这些字只读 z;在“曾层材裁鳌漕杂昨蹲情齐潜静就截全聚”这些字里 z, dz 两读。

同书第四卷“方言字汇”列有从母 42 个字,它们上海话的读音在正表里是(高氏原书的记音不标声调):

A 类: 座 zu、自 zɿ、字 zɿ、蚕 ze、前 zie、墙 ziaŋ、匠 ziaŋ、曹 zo、皂 zo、贼 zə、嚼 zia、族 zo

B 类: 慈 dzɿ、材 dze、在 dze、齐dzi、罪 dzəe、鳌 dzə、懈 dzə、残 dzə、贱 dzie、全 dzie、秦 dziaŋ、尽 dziaŋ、存 dzəŋ、曾 dzəŋ、赠 dzəŋ、情 dziaŋ、静 ziaŋ、藏 dzəŋ、樵 dzioŋ、就 dziaŋ、聚 dzy、丛 dzəŋ、从 dzəŋ、杂 dze、集 dzi、截 dzi、绝 dzi、疾 dzi、寂 dzi、昨 zo

A 类字是高本汉说的只有一种摩擦音 z 的读法,所以他只能列 z 读音,但是 B 类 30 个从母字是高本汉自己说有 dz/z 两种读法的,可在他的正表里

几乎全列塞擦音 dz(只有两个记为 z, 28 比 2, 太悬殊了!), 想必这样来更符合他对从母 *dz 的构拟。

还有一例,更能说明他选读音的倾向性。中译本第 323 页举了一个例子说明当时的上海话有 dz/z 的异读:

我们在上海方言里证实了一个近代的倾向,就是把塞擦音 dz 变成摩擦音 z, 例如:“泽”(澄母)上海 dzə? 又读 zə?。

可是在同书卷四“方言字汇”第 712 页正表里“泽”的上海话读音是 dzə (上海话入声韵高氏在正表里统统省去喉塞音韵尾),正表下的附注也没有列出“泽”的摩擦音的另读。

如果说高氏选字作比较有倾向性的话,那正表里的比较更有问题。举一个鱼韵的例子就能说明问题。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第 673 至 676 页鱼韵正表列有 25 个汉字读音对比表。表 4 列出了其中属闽语的汕头(闽南)和福州(闽东)的读音,“古音”行则是高氏构拟的中古音。

表 4

	居	去	渠	巨	语	虚	于	余	猪	除
古音	kj̥wo	k ^h j̥wo	g ^h j̥wo ²	g ^h j̥wo ⁴	ŋj̥wo	xj̥wo	pj̥wo	ʃwo	tj̥wo	d ^h wo ²
汕头	kw	k ^h w	k ^h w	k ^h w	gw	hw	w	w	tsu	ts ^h u
福州	ky	k ^h œy ⁵	k ^h y	k ^h œy ⁶	ŋy	hy	y	y	ty	ty

	箸	阻	初	锄	助	梳	诸	处	书	署
古音	d ^h wo ⁶	tʂwo	tʂ ^h wo	dʐ ^h wo ²	dʐ ^h wo ⁶	ʂwo	tçwo	tç ^h wo	çwo	z̥wo
汕头	tsu	tso	ts ^h o	ts ^h o	tso	so	tsu	ts ^h u	su	su
福州	tœy	tçu	tç ^h u	t ^h y	tçou	su	tçy	tç ^h œy	sy	sy

	如	女	吕	胥	序
古音	nj̥z̥wo	nj̥wo	lj̥wo	s̥wo	z̥wo
汕头	dzu	dzu	lu	su	su
福州	y	ny	ly	sy	œy ⁶

从表 4 所列的字和读音我们可以看出高氏语音比较的特点:

第一,高氏鱼韵正表共有 25 个汉字读音,所收字覆盖鱼韵各声母组。如“居去渠巨语虚于余”属见系声母;“猪除箸”属知组声母;“阻初锄助梳”属